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Kultur in der Emigration

Studien über die europäischen
intellektuellen Emigranten in
der Nazizeit

李工真 ©著

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

文化的流亡

人民出版社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Kultur in der Emigration

Studien über die europäischen
intellektuellen Emigranten in
der Nazizeit

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

李工真◎著

文化的流亡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李工真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8

ISBN 978-7-01-008982-9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知识分子-难民-研究-欧洲-现代

IV. ①D7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0415 号

文化的流亡

WENHUA DE LIUWANG

——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

李工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9.25

字数:37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08982-9 定价:6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言

1988年10月我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里尔大学留学时,认识了德国的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库尔特·迪威尔(Kurt Düwell)教授。作为他的学生,我有幸参加了他开设的一门讨论课(Seminar)《纳粹统治时期的犹太难民问题》。正是在这门讨论课中,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德国式的高等教育,也第一次接触到犹太人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学术界的德国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德国的政治史,其学术性基本停留在一般通史的水平上,有关德国历史上的犹太人问题的专门性研究还没有出现在中国学者的思考之中。然而,在参加了这门讨论课后,我强烈地感觉到,要深入研究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历史,要揭示纳粹暴政的罪恶,就必须研究犹太人问题,因为希特勒的纳粹党是个典型的种族主义政党,这个政党是以反犹太主义作为它世界观的核心内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能成为解开纳粹暴政之谜的一把钥匙。然而,要在这方面有所创新,不仅需要了解德意志的政治史和经济史,还必须了解德意志的宗教史、民族史、文化史、教育史、科学史和社会史。

对于希特勒纳粹党的反犹运动究竟给德国带来了什么、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人们很容易从欧洲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的结果中寻找答案。这样的答案也无疑是正确的,但并不完整和全面,因为这只是从死亡数字中找到的答案,而问题在于,在纳粹统治时期的整个“德意志第三帝国”境内,即包括原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整个中欧地区,还有50万讲德语的犹太人作为难民流亡出去了。这就派生出如下问题:为什么纳粹政权要迫害犹太人?为什么这个政权又让这些犹太人流亡出去了?为什么其他国家会接收这些犹太难民?这些接收国奉行的是什么样的难民政策?接收国的公众社会对犹太人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它们为犹太难民提供了什么样的生存条件?这些犹太难民在

流亡岁月中经历了怎样的命运？他们对接收国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一连串的问题使我认识到：纳粹德国的反犹迫害与犹太人的反应，才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欧洲犹太人问题；纳粹党徒对犹太人的集体大屠杀与少部分犹太人的流亡，才使欧洲犹太人问题变成了人类现代史上的一个世界性问题。显然，要了解这样一个问题的世界性意义，除了研究那场对犹太人的集体大屠杀外，还必须对纳粹统治时期的犹太难民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就是我当年参加库尔特·迪威尔教授那门讨论课时最深的体会。

归国后的多年来，我从未停止过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在我的第一部专著《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反犹主义问题一直是作为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阴暗面而存在的；在我近年来发表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论文中，20世纪30—40年代犹太难民流亡潮的问题也一直是我的主题。但是这一问题相当复杂，仅是涉及的难民接受国就达75国之多，而流亡出去的犹太难民也涉及各色人等，要想进行深入研究，只能从有选择的对象开始。于是，我选择了其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流亡群体——知识难民——作为我的研究对象。

所谓“知识难民”，在此泛指那些在20世纪30—40年代逃离纳粹统治的科学家、律师、医生、记者、工程师、音乐家、造型艺术家、作家、舞台艺术家以及导演、制片人之类的人。他们当中的90%以上有犹太血统，并且绝大多数来自讲德语的原德国、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中欧地区。这些人都接受过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德国式高等教育，无疑属于中欧犹太人中的文化、科学精英，也是“德意志—犹太文化共生现象”的杰出代表，因而自然成为了希特勒推行的“清除犹太人”政策中首先驱逐的对象。由于他们往往不是靠物质上的财富，而是靠精神上的财富来立足于世的，这一特点实际上也便于他们流亡，因为精神上的财富是可以随着他们的流亡而带走的。当纳粹反犹运动的灾难降临到这个少数民族身上时，这些知识难民往往成为其中最早、最快地逃离这个暴政的人。因此，这一点并不奇怪：这些知识难民成为了在这场纳粹浩劫中存活率最高的一类犹太人。

一般犹太难民流亡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在接收国能否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这些知识难民流亡的成功，则取决于他们在接收国能否继续发挥他们各自在科学、教育、文化、社会上的功能，因为他们毕竟是一批创造精神财富的人，一旦丧失了这种创造功能，他们就简直生不如死。因此，他们往往会向那些能为他

们提供这种创造可能性的国家流亡。而最有可能为他们提供这种创造机会的国家,正是远离欧洲战火、具有长期移民传统和西方民主制度的美国。

1933—1945年间,美国接收了13万犹太难民,这个数量虽只占有流亡海外的犹太难民的1/4左右,但其中却包含了60%以上的知识难民和75%以上的流亡科学家。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接收如此之多高文化素质的知识难民与另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几乎同步发生,即正是在1933—1945年间,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了新的世界科学、文化中心。这两者之间的关联问题自然成为了世界各国文化史、教育史、科学史专家们极感兴趣的问题。而澄清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正是本书作者的主要意图之一。

一个重要的条件为我对20世纪30—40年代这场欧洲知识难民潮的研究提供了便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几乎所有关于犹太流亡者经历的记载,都是以知识难民作为主要对象的。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知识难民代表着讲德语的犹太人不死的灵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知识难民要比一般难民更为出名、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更善于表达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和感受的缘故吧。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美国的史学家们所做的贡献,他们对知识难民档案的整理,他们出版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已为研究这段文化流亡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有以上这些条件,在国内学术界还无人研究这一问题的情况下,我于2001年5月以“文化的转移与接受——纳粹统治时期欧洲知识难民研究”为题,申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并获得了立项批准。眼前这本著作就是本人这些年来艰苦研究工作的结果。

李工真

2009年8月1日于武昌珞珈山

目 录

序 言	1
导论:国际学术界关于欧洲知识难民问题的研究	1
第一章 欧洲知识难民潮的由来	9
一、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	10
二、德意志反犹主义的历史传统	19
三、现代化大学的发展与学者阶层的危机	30
四、“文化国际化”与“文化民族化”的对立	44
五、纳粹文化政策的目标与驱逐行动的动机	58
第二章 欧洲知识难民向美国的流亡	64
一、纳粹德国“文化清洗运动”及其规模	65
二、决定德国科学家流亡方向的基本因素	78
三、美国高校“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	86
四、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方向的转变	92
五、美国民间援救组织的措施与行动	99
六、阿尔文·约翰逊与“流亡大学”的创办	108
第三章 流亡世界其他国家的欧洲知识难民	127
一、流亡瑞士的知识难民	128
二、流亡英国的知识难民	138
三、流亡加拿大的知识难民	155
四、流亡土耳其的知识难民	167
五、流亡拉丁美洲诸国的知识难民	177
六、流亡中国的知识难民	191

第四章 欧洲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	202
一、“失语性”问题:流亡经历中的共同问题	203
二、流亡作家的“失语性”问题	209
三、流亡人文科学家的“失语性”问题	217
四、流亡社会科学家的“失语性”问题	223
五、流亡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的“失语性”问题	228
六、流亡艺术家的“失语性”问题	233
第五章 欧洲知识难民与美国社会的“一体化”问题	240
一、怀念老家乡与寻找新家乡	241
二、流亡记者与时事评论家的“美国化”道路	250
三、“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社会	258
四、“流亡大学”教授们的“美国化”	272
第六章 欧洲知识难民对美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贡献	285
一、流亡物理学家与美国的物理学	288
二、流亡化学家与美国的化学	298
三、流亡数学家与美国的数学	308
四、流亡科学家与“曼哈顿工程”	321
五、流亡建筑学家与美国的建筑业	339
第七章 欧洲知识难民对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	350
一、流亡艺术史专家与美国的艺术史学科	351
二、流亡音乐家与美国的音乐世界	361
三、保罗·F.拉萨斯菲尔德与美国的社会学	374
四、德意志“经济改革派”与罗斯福“新政”	387
五、流亡法学家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	403
六、流亡社会科学家与纳粹主义研究	411
结束语: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	425
参考文献	435
后 记	457

导论：国际学术界关于欧洲 知识难民问题的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以前，由于纳粹的迫害，整个“德意志第三帝国”境内逃亡出了 50 万有犹太血统的难民。^① 面对这场滚滚而来的犹太难民潮，传统的移民国家美国成为了最大的难民接收国，接收了其中的 13 万人。^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被美国接收的这 13 万人中，包括了遭到纳粹“文化清洗运动”驱逐的绝大部分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和文化精英，从而使这场向美国的流亡变成了整体性的文化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有关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问题的研究就开始了。那些在美国援助组织中担任过要职的负责人，通过他们的著作，向人们披露了接收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部分内幕。美国“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主席斯蒂芬·达根(Stephen Duggan)与他的助手贝蒂·德鲁里(Betty Drury)合著的《拯救科学与知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的故事》，是战后初期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作。^③ 这类著作突现的主题是“拯救科学和知识难民”，尽管其

① “德意志第三帝国”(1933—1945)，即纳粹德国，其版图是随着希特勒扩张政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时，这个纳粹帝国已不仅包括了 1937 年以前的德国，还包括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割让的德国东部省份的所有地区。据统计，在这片讲德语的中欧文化空间里，总共生活有 87.5 万犹太人，而被迫出逃的犹太难民达 50 万以上，其中，33 万来自德国，15 万来自奥地利，2.5 万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纳粹后来屠杀的 600 万犹太人主要是东欧的犹太人，当然也包括少部分没有逃出希特勒魔掌的中欧和西欧的犹太人。——作者

② 参见 Horst Mö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84, S. 47。

③ 参见 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8。

中提及参与原子弹生产的“曼哈顿工程”中的流亡科学家,但很少涉及他们的具体贡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20年间,由于受旧的“熔炉理论”的长期影响,在有关流亡科学家问题的研究上,美国本土派学者仅对这些流亡者与美国社会的“同化问题”感兴趣,关注的也只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适应能力。这种学术倾向,也许对于研究那些在19世纪来到美国的移民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类移民绝大多数都很贫穷,并来自落后的欧洲边缘地区,往往属于只受过很少教育的群体。而1933年后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却有所不同,尤其是这些流亡科学家,不仅来自大专院校的学术环境,而且绝大多数都已经确立了牢固的世界观,以致他们与新大陆社会的“一体化”问题,仅仅用那种“同化”标准来进行描述已显得远远不够了。

事实上,早在1952年冬季,一批1933年后流亡美国的有犹太血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和部分当年参与援救工作的积极分子,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了第一次以“文化的迁移”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其内容已开始涉及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对美国的社会科学、神学、心理学、艺术史等领域的影响问题。这次会议的成果通过出版由雷克斯·克劳福德(Rex Crawford)主编的学术会议论文集《文化的迁移,在美国的欧洲学者》体现出来。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著名的流亡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果断地批驳了这种“同化理论”的狭隘性。^①

但是,这种“同化理论”的传统观点和思考角度,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真正发生变化。在越南战争引发的公众意识危机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史”的复兴,对美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价值观及其政治影响的探讨,改变了移民研究的理论前提。在此,美国的“民权运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一种新的多元性的理解取代了旧有的“熔炉理论”。它不再从无权的移民群体的消极适应出发,而是将不同的种族、文化和社会集团对美国社会积极、丰富的影响置于这种移民研究的前景之中。于是,“文化移入”的新术语取代了那些“同化”、“适应”的陈旧单轨式概念,并阐明了这一彼此丰富和变化的充满活力的进程。

20世纪60年代末,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流亡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

^① 参见 Rex Crawford, *The Cultural Migration, The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3, p. 52。

段,部分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流亡科学家和美国本土派学者也参与在这场“文化移入”的研究中。例如,从意大利流亡美国的女历史学家劳拉·费米(Laura Fermi)于1968年出版了她的著作《杰出的移民,来自欧洲的知识迁移,1930—1941》。^①作者以不小的篇幅,评价了欧洲流亡科学家给美国教育制度带来的那种不花成本的赢利,并将这场流亡与拜占庭的科学家在15世纪从君士坦丁堡向西欧的流亡相比,以证明这场流亡给德国科学带来的严重损失以及给美国科学带来的巨大收获。但由于这本著作的时间段只延伸到美国参战时的1941年12月,因而还远远未能就欧洲流亡科学家对美国科学的具体贡献展开全面的论述。

196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弗莱明(Donald Fleming)和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主编的论文集《智力的迁移,欧洲与美国,1930—1960》则是这方面的一种突破。^②它收集了14篇重要论文,其中不少是著名的流亡科学家自己的回忆录,涉及欧洲流亡科学家对美国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贡献问题。编者选择这种时间跨度是为了证明,这场智力的迁移实际上是从经济大危机期间的1930年就开始了。因此,他们特别将1930年移民美国的前汉堡大学著名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的经历和成就也包括在内。这表明美国学术界已经开始对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从德国到美国的“文化移入”的具体细节发生了兴趣,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这场“文化移入”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美国本土派学者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们过去只是力图对流亡科学家与美国的一体化作一种一般性的概括,而现在不得不承认,这种工作只涉及极为有限的视觉范围。但他们又过于缺乏欧洲背景知识,这就使他们几乎无法理解由这些流亡科学家带给美国的知识观念与传统。”^③

最能为这种“文化移入”研究提供欧洲背景知识的显然是联邦德国的学术界。但联邦德国的现代史研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过一段长达约20年的相对沉寂期,在这段时间里,从整体上讲,学术界还远远没有从事这方面研究

^① 参见 Laura Fermi, *Illustrious Immigrant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 1930—194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② 参见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③ Charles John Wetzel, *The American Rescue of Refugee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from Europe, 1933—1945*,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的学术氛围。当然,联邦德国也仍然有人从事相关研究,第一位研究者是年轻的德国学者黑尔格·普罗斯(Helge Pross)博士。他得到了美国一家基金会的资助,于1952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并在弗朗茨·诺伊曼的指导和鼓励下,花了两年时间专门从事有关德国科学家流亡问题的研究,并于1955年在柏林出版了德文版的《流亡美国的德意志大专院校学者》一书,这也是在联邦德国出版的第一部相关著作。^①由于联邦德国学术界当时的独特氛围,这本著作长期以来只是一枝独秀。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尤其当与纳粹政权完全无染而“历史清白”的新一代现代史专家完全成长起来后,一场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但是,新一代的联邦德国学者大多只是在对纳粹德国迫犹政策的研究中,附带性地涉及犹太流亡科学家问题,在此,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纳粹种族主义政策之下的“文化清洗”与驱逐问题。尽管这对于探讨纳粹德国反犹太知识分子政策的动机以及流亡科学家的出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研究仍然不足以清晰描绘犹太知识精英的这场文化转移的整体性图景。

由于这些矛盾与缺陷,20世纪7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和美国学术界之间开始了日益广泛的交流。一批来自联邦德国的新一代历史学家、社会史专家与科学史专家,带着他们在德国和欧洲各国图书馆和档案馆中收集到的宝贵资料前往美国,并在利用美国当年的援助委员会、基金会以及大学、学院提供的流亡科学家名单和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开始对这场“文化转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与此同时,美国的新一代学者,尤其是当年流亡者中的第二代人,也前往联邦德国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这种跨大西洋的学术交往,无疑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在这种背景下,有关流亡研究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始在联邦德国频繁举行,新一代的联邦德国相关学者于1974年得到了德意志研究基金会(DFG)的大笔资助,使流亡研究成为了一种跨学科的努力,研究者们过去从单独学科的视野进行的研究已开始向一种全球视野的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

为了提高“流亡研究”的水平,联邦德国学术界首先开始了对原始档案材料的整理工作。这方面的头一批成果是分别于1976、1978、1980年出版的三卷本

^① 参见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Verlag, 1955。

《德意志流亡报刊手册, 1933—1945》。它们由莉泽洛特·马阿斯 (Lieselotte Maas) 主编, “收录了已查明的在 1933—1945 年间出自德意志流亡者之手的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稿、通讯, 其种类达 400 份之多。”^①这套手册冲破了那种苍白的目录学记录的界限, 将材料开发与文献学、历史编辑学以及跨学科研究统一在一起。与此同时, 在美国, 1978 年也出版了由美国历史学家约翰·M. 斯帕雷克 (John M. Spalek) 主编的《1933 年后流亡美国的讲德语移民的档案材料指南》, 这部《指南》在对 300 多份档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头一次证实了劳拉·费米提出的“美国因这场流亡在教育 and 科学上赢了利”的观点。^②

由于许多当年的流亡科学家陆续去世, 且只留下很少的回忆录, “这类著作本应向人们介绍这场文化转移的具体细节以及它对美国科学、文化的影响, 现在反倒成了秘密”^③。因此,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两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史专家、科学史专家开始投入到一场“抢救历史”的行动之中。他们通过寻找、采访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后代, 推动了传记史、口述史以及“流亡社会学”的发展, 以致国际学术界对这场文化转移的研究已变成了一个专门性的学科领域。

这一时期在文献整理工程中的最大成就, 当数由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与纽约犹太移民研究基金会合编的三卷本《1933 年后讲德语的流亡者传记手册》, 具体的主编为维尔讷·勒德尔 (Werner Röder) 和赫尔伯特·A. 施特劳斯 (Herbert A. Strauss)。前两卷为文本卷, 第一卷为“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卷”, 于 1980 年出版, 第二卷为“艺术、科学和文学卷”, 第三卷为“名单登记总卷”, 后两卷均于 1983 年出版。^④

这是一部涉及流亡到世界上 75 个国家包括第二代流亡者在内的所有讲德语的精英约 8600 人命运的文献, 使人们能够看到这场始于纳粹德国的驱逐运动

① Lieselotte Maas (Hrsg.), *Handbuch der deutschen Exilpresse, 1933—1945*,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1976, Bd. I, S. 13.

② 参见 John M. Spalek (eds.), *Guide to the Archival Materials of the German-speaking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33*,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8.

③ Stuart H. Hughes, *The Sea Change. The Migration of Social Thought, 1930—194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p. 1.

④ 参见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ünchen und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Jewish Immigration (Hrsg.), *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r deutschsprachigen Emigration nach 1933*, New York: K. G. Saur, Bd. I, 1980. Bd. II, 1983. Bd. III, 1983.

所造成的人力和思想潜力上的损失,遭受驱逐者被迫流亡的历史,流亡者在政治上的组织结构,他们对客居国社会生活的贡献,以及部分流亡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向故乡返回的面貌。这 8600 人是从 25000 名讲德语的流亡者个人档案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其中有 5500 人属于文化知识难民,其余为政治流亡者或流亡企业家。在这 5500 名文化知识难民当中,有 2400 人属于科学家,1600 人属于作家和时事评论家。总之,这部文献“所涉及的人物圈子不限于德国 1937 年的边界之内,而是包括了所有讲德语的中欧文化空间,即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割让的德国东部省份的所有地区。这些人出于政治、世界观、种族上的原因,遭到了迫害或受到了反犹措施的压力,在 1933—1945 年间逃离了以上所涉及的国家 and 地区”。^①

这套三卷本的《1933 年后讲德语的流亡者传记手册》真可谓“一部有关流亡研究的百科全书”,正是借助它对档案材料的整理、归档和发表,新一代的欧美学者对这场“流亡”进行的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和科学史的研究,以及社会学上的数量分析,才具有了一种充实的基础。它的问世,无疑带来了一场流亡研究的新高潮。

在这部重要的文献工程的影响下,20 世纪 80 年代后出现了一大批与流亡科学家研究的相关著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 1983 年出版的由美国历史学家贾雷尔·C. 杰克(Jarrell C. Jackman)和卡拉·M. 博登(Carla M. Borden)主编的论文集《缪斯逃离希特勒,文化的转移与接受,1930—1945》^②,1984 年出版的由德国历史学家霍斯特·默勒(Horst Möller)撰写的专著《文化的迁出,1933 年后流亡的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③,1986 年出版的由德国历史学家赫尔穆特·F. 普潘讷(Helmut F. Pfanner)主编的论文集《流亡中的文化交流关系》^④,1989 年出版的由德国历史学家哈约·冯克(Hajo Funke)主编的口述史集《另一种回忆,

①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ünchen und der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Jewish Immigration (Hrsg.), *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r deutschsprachigen Emigration nach 1933*, New York: K. G. Saur, Bd. I, 1980, S. 3.

②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3.

③ Horst Mö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84.

④ Helmut F. Pfanner (Hrsg.),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 Exile across Cultures*, Bonn: Bouvier Verlag Herbert Grundmann, 1986.

与流亡犹太科学家的谈话》^①。

更为可喜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著名的流亡科学家集团的专门性研究。例如，1985年出版的由美国历史学家马丁·杰伊（Martin Jay）主编的论文集《永久的流亡，有关从德国到美国的知识难民文集》，就是专门对流亡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展开研究的。^② 而1987年出版的由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迪特尔·克隆（Claus Dieter Krohn）撰写的专著《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和经济科学家》，更是一部对集中于纽约那所著名的“流亡大学”中的欧洲科学家难民集团研究的杰作。^③ 至于1988年出版的由德国历史学家伊尔加·施鲁巴尔（Ilja Srubar）主编的论文集《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却与以上两本著作不同，它没有完全集中于对某个特定的流亡集团的研究上，而是集中在对那些最为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研究上。^④

在欧美学术界，直到20世纪90年代，流亡研究仍然方兴未艾，不仅有大量涉及流亡到欧洲各国的科学家难民的研究论著问世，而且也有不少关于30—40年代欧、美各国政府难民政策方面的著作出版，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98年出版的由德国历史学家卡塔琳娜·迈尔（Katharina Meyer）撰写的专著《没有人想要他们，1933—1945年间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流亡政策》。^⑤ 联邦德国史学家们甚至还深入到对德国某个具体的地区和城市的流亡科学家的追踪研究上，这种研究是在对尚还在世的流亡科学家，或是对他们的后人进行采访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运用这种新方法上，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1998年出版的由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库尔特·迪威尔（Kurt Düwell）领衔主编的论文集《在杜塞尔多夫遭到驱逐的犹太艺术家和科学家》，它不仅体现出对流亡科学家或艺术家个人的具体经

① Hajo Funke (Hrsg.), *Die andere Erinnerung. Gespräche mit jüdischen Wissenschaftlern im Exil*,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Taschenbuch-Verlag, 1989.

② 参见 Martin Jay (eds.), *Permanent Exiles, Essay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 参见 Claus Dieter Krohn, *Wissenschaft im Exil, Deutsche Sozial-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in den USA und di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1987。

④ 参见 Ilja Srubar (Hrsg.),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ä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er, 1933—1945*,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88。

⑤ 参见 Katharina Meyer, *Keiner will sie haben, Die Exilpolitik in England Frankreich und den USA zwischen 1933 und 1945*,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Verlag, 1998。

历史和贡献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且还配有大量相关的历史照片。^①

总之,随着各类文化流亡者名单的公布,各种相关人物传记作品的问世,各种对当事人及其后代的访谈录的出版,大量日益接近精确的有关流亡科学家的人数、规模、结构、出版物方面的数量分析,以及对流亡科学家在各个学科中的具体贡献和影响的研究,使这一专门性领域所涉及的问题,早已不再是流亡科学家个人的命运和他们与客居国社会的“同化”问题了,而是这场文化转移对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影响和意义。

然而,当今中国学术界对如此重要的研究领域几乎无人问津,只有少数自然科学史专家在研究诸如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生涯时才有所涉及,远远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透视这场文化转移的意义。为了将这一重要研究领域介绍给中国学人,也为弥补中国学术界的这一缺陷,笔者愿在当今国际学术界有关这一领域的资料开发和研究的基础上,对欧洲知识难民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笔者相信,通过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档案材料以及相关著作的解读,将有助于中国学术界加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从而加深对这一时代的理解。

^① 参见 Kurt Düwell / Angela Genger / Kerstin Griesse / Falk Wiesemann (Hrsg.), *Vertreibung jüdischer Künstler und Wissenschaftler aus Düsseldorf, 1933—1945*,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98。

第一章 欧洲知识难民潮的由来

在20世纪的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位政治领袖比1933年1月30日登上德国总理宝座的纳粹党元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更清楚这一点:公开展示的运动最能吸引人们的想象力。在所有那些不断上演的、引人注目的、给承受者和旁观者都留下永恒记忆的事件中,纳粹分子始终都是主角:1933年2月“国会纵火案”之后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大规模逮捕和无情迫害;1933年5月成千上万狂热的纳粹信徒围绕着首都柏林的大游行;1934年9月纽伦堡党代会上排列齐整的人群有序的欢呼喝彩……然而,1938年11月“帝国水晶之夜”中残酷的破坏以及对圣贤的亵渎,却把第三帝国的另一面迅速展示出来,而所有这一切又立即被另一些更加展现本质的场面所超越:“闪电战”以及“最后解决方案”的实施。

对于那些体现文化和知识界成就的人们来说,“德意志第三帝国”中最骇人听闻的一幕是纳粹党徒把教育、科学、文化领域中一批最有创造力的人——学者、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剧作家和建筑师——赶出了德国,并将他们的书籍统统焚毁,而这些人或是在魏玛共和时代得到过国际公认并在政治领域里属于左派或左翼的民主、自由党成员,或是仅仅因为他们属于不受欢迎的所谓“非雅利安人”。

当这场史无前例的知识难民潮滚滚而来时,不少同时代的西方观察家都将纳粹的这种暴行视为“对德意志精神的背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自近代以来,德意志人的思想文化主流便开始受到一种反理性主义倾向的引导,这种倾向并非绝对地反对一切思想成果,而是反对或蔑视欧洲启蒙运动中提出来的“人类能通过理性活动来理解自然”的观点。这一倾向扎根于对理性时代不切实际的强烈反抗之中,它在客观、机械的世界主义与主观、有机的民族主义之间设定了一种对抗关系。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与法国拿破仑军事占领相联系